

改变知行分离，要让教授们摆脱“成功的诅咒”

改革开放以来，身处中国的商业实践，中国商学院也同样经历了快速成长。如何建设世界级的商学院？作为与实践联系最密切的学术机构，当下的中国商学院要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必须扎根中国。所谓扎根中国，不是道听途说，不是纸上谈兵，更不是舶来主义，而是深入中国的经济管理实践，发现问题、提出想法、建言献策，进而升华凝炼为具有实践基础的经济管理理论。这是商学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破局之道，更是学术机构的社会责任。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商学院在深入实践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不仅商学院，高校的一些科研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通病。对商学院来说，行业研究很有可能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破题之举。行业研究可以改变我们对“科研”的认识，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加之去年国家相继出台了诸多导向性政策，高校“破五唯”的导向让我们更有底气去推行行业研究。

■陈方若

推行行业研究，现实世界并没有针对单一领域的问题

中国的大学发展至今，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包括商学院也是如此，但是这些成功的经验都是基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观学术机构对行业乃至经济发展的反哺，除了文献的发表，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多。

大学这一学术机构，除了育人以外，还承担了科研任务，大学里的科研分为两类：基础理论方面的突破和实践研究方面的建树。

前者为后者提供基础，而后者往往为前者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两者应该相辅相成，但从商学院的发展来看，两者缺乏关联，导致两者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即便在商学院内部，要使科研深入服务实践的理念达成共识也并非畅通无阻。

很久以前，商学院的一个主要研究范式是“企业蹲点”，蹲几个月甚至几年，把自己变成企业的一员，睁大眼睛、开动脑筋，把积累的大量素材带回学校，再进行总结提升。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就曾在通用汽车蹲点两年，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管理理论。

遗憾的是，这样的优良传统目前已经荡然无存，而且全球商学院

皆如此。我们大多数管理学院的教师们已经习惯于坐在书桌前读论文，看资料。

除此之外，我们还面临另一个困境。长期受困于学术评价的枷锁，商学院的教师也已形成一种“自觉”——从理论到理论。商学院的每一位教师都已经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耕耘多年，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有了很深的造诣。但是，他们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使得我们在做行业研究的时候，只见熟悉的树木，而看不见森林。

现实问题通常比较复杂，并非单纯对应某个研究领域，在传统的思维习惯下，我们很容易错过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这种错过不仅使远离了学术对实践的指导，还会使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越走越偏。这在学术上被称为是“成功的诅咒”（the victim of own success）。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现象在我们研究工作中经常发生。这也是为何我们有些学生毕业后，走上重要的管理岗位，还经常感慨不得不把很多所学的知识忘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行业中的根本问题。

同时，我们所熟悉的大多数大学教师早已习惯单打独斗，尊奉个人英雄主义。这在学术领域是常见的，甚至是被鼓励的，比如，独立作者的论文通常在评估体系中可以加分。但当下这个时代，管理学研究不可能仍然是单一学科，或者凌驾于其它学科之上，更不可能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完成。

管理学研究需要的是跨学科。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管理学研究牵涉到的学科领域包罗万象。这些不同的领域会有完全不同的问题，需要的研究背景也完全不同。

如果我们的教师不能走出跨学科、跨领域合作的这一步，我们自然就会成为井底之蛙，而自己却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

正是基于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在2018年开始推行行业研究。行业研究本身的实践意义不用多言，而且行业研究同样有其复杂性，没有一个行业是针对某一个领域的，即便是集成电路这样的专业性极强的行业，要研究透彻，也牵涉到材料、器件、微电子、供应链、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这样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教授走出单一的学科，也走出校园。

破除“成功的诅咒”，如果不能打破枷锁，那就另辟蹊径

很多人都认为，大学里的老师应该是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研究。这个看法很有意思，应该说对也不对。鼓励教师研究的兴趣驱动，鼓励他们自由探索固然有其重要积极意义，但是小到一个人，大到学术机构，发展往往大概率受制于环境，同时人也会对环境起反哺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写过一本书《美国真相》，其中提到，西方国家太注重市场的作用，总认为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但实际上，这个无形的手总是失灵。这是为什么？斯蒂格利茨提出，也许这

只无形的手根本就不存在。同样，商学院的发展，乃至大学的发展也有相似之处，学术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但是并非完全遵循某个规律，老师们的研究必须有自由的兴趣在其中，也必须有一些自上而下的导向，尤其是商学院，也需要通过组织行为，将“指导实践”的导向渗透到科研、教学之中。

为了破除所谓“成功的诅咒”，我们用“纵横交错，知行合一”来鼓励我们老师横向进行学科交叉，纵向与行业产业链直接形成密切的融合。希望老师能够带着自己的理论积累和头脑出去看看业界，用更长的时间，去钻研一个行业，并且形成一些管理理论。

说实话，要推动老师们走出去并不容易。刚开始也有反对的声音。很多人都会问，现在的行业研究那么多，商学院的行业研究有什么不一样？

商学院的行业研究不只是为了投资。不论是投行或者咨询公司都有行业研究，甚至近年来出现了企业自设研究院的热潮，但是，象牙塔中的行业研究应该更“超脱”一些，也更“综合”一些。仅以养老行业研究为例，在这个行业研究的团队中，有研究养老产业的专家，有医学院的专

业、有公共卫生领域政策制定的学者，有人工智能的学者，因为这与养老的智能装备也有关系。商学院的行业研究扎根大学，跨界交流，需要的是多方面的理论基础。

推动老师们走出去的另一个困难在于评价机制。

虽然我们鼓励老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但是职称晋升、项目审批乃至学科评估，仍然需要考虑学术成果。为此，我们鼓励一些已经进入终身教职序列的老师率先走出去。因为他们受到各项评估指标束缚相对比较弱，理论积累相对也更深厚，当他们能够走出去深入行业研究，对年轻人也能够起到更多的引导作用。

虽然说服老师们走出去并不容易，但是老师们真的愿意走出去后，如何做好行业研究同样不容易。

大家已经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读文献。要鼓励老师参与行业研究，如果暂时没有制度保障的话，那学院和学校充分调动充足的资源，为老师走出去提供保障。目前，我们的校友成为行业研究的丰富资源和支持力量，更有校友企业听说我们在做行业研究时，第一次时间加入，在多次参与行业研究活动中，毫不犹豫地掏出千万捐赠。

值、有分量的咨政报告。

推动行业研究，收获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并且使得实践和理论结合成为一种习惯，同样需要更多方共同的支持。

事实上，在过去很长时间，研究界、产业界和相关部门的急功近利也助推了商科教授研究发展的“脱轨”。虽说经管学科是与现实联系最密切的专业，经管学科的教授不能真正地坐冷板凳，必须走到实践中去，但是经管专业的教师们也不是万金油，对一个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就发表各种所谓的“洞见”，这是不合适的。这样的行业研究或者是区域经济发展方向的报告，带来的危害更直接，因为那样形成的，只能是充满误导的报告。只可能是充满误导的报告。

2019年是开展行业研究工作

的元年。老师们响应热烈，80多位老师在以学科为主线的横向研究的基础上，组成了25支以行业为主线的纵向研究团队。行业研究论坛从第一期的只有业界专家上台演讲到现在我们有不少老师可以深度内容和业界专家交流。今年团队扩展到30多个，覆盖金融、大健康、在线新经济、人工智能、零售、智能网联汽车等重要领域。同时，为了更好地给各行各业输送最为鲜活行业智慧，聚焦金融科技、创新创业、汽车这三个领域的行业社群试点班于2019年启动，近50个名额有1000多人以上报名。目前，已有一些理论上的突破正在酝酿之中了。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院长）



教育与科技融合：仅有新技术进课堂并不够

■朱希祥

教育与科技总是相互交错、纠缠、互补，它们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关心的话题。科技的发展正在逐渐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每天身边都有新生的职业，而科技除了改变我们的教育，也在改变我们的孩子和世界的关系。用过去的教育方式，孩子可能很难适应未来的世界，而这不光是中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全人类都需要找寻答案。

当下，我国教育部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中小学幼儿园的课程指南里，均含有科学或科技的内容。但在信息、网络、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处理须臾不离的手机或平板电脑等高科技产品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如何处理令社会、家长、教师头疼的无数问题，比如到底该限制学生使用电子产品，还是主动、积极地引导孩子利用和使用电子产品？这些都是教育与科技的关系，它们两者间，究竟是隔断、跟随、引导还是融汇、融合？

科技总是走在教育之前，而要融合需要的不仅是技术进课堂，更需要高质量的师资以及教育界对科技的理解

教育与科技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这在我国中小学和幼儿园，包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学校教育基本都如此。但是，从2012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试行的电子书包等技术进课堂的实践，至今却不能说是获得了成功并且可以推广。

而在其他方面也一直处于不断尝试和调整之中。

以我国学前教育为例，教育部制定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五个领域中的“科学”（其余是健康、语言、社会和艺术四个领域）分“科学探究”与“数学认知”两大部分。各项目标是，亲

近自然，喜欢探究；具有初步的探究能力；在探究中认识周围事物和现象；初步感知生活中数学的有用和有趣；感知和理解数、量及数量关系；感知形态与空间关系等。

在小学，根据教育部最新修订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从2017年9月开始，一年级就增设了科学课，并将其作为基础性课程。

但其后在2018年，为了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规定（小学）家长陪伴孩子时尽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有意识地控制孩子特别是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

同年，国务院、教育部将编程纳入课堂教学及大学考试，全国主要省市已陆续落实。浙江去年将信息技术纳入高考，江苏明确在小学阶段开设信息技术课程，山东、北京也将陆续把Python编程纳入小学及高中课程。

可以说，截至目前，教育总是在跟着科技走，教育并没有主动性，并且科技产品也不了解教育的性质与需求，更不用说师资和技术跟上了。

但是，在一部关于未来教育的纪录片中，以色列“从幼儿园开始培养诺贝尔奖得主”的理念，令人震惊。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介绍说，他们在2011年就开始STEAM课程（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等各领域融合的综合教育）。孩子们从两岁半开始学习物理课、数学课、英语课、天文课。一个4岁的孩子，每周都会上这些课。从课程到教师，家长们都非常认可。

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教育科技中心的副总裁说：“……所有的教育系统都处于巨大的危机中，因为与其它行业不同的是，其它行业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如何进步并逐步适应未来时代。但教育制度却落后于时代。教育系统并不了解数字化学习，

同时对数字化时代也不够理解……我们必须了解电脑时代的思考逻辑。从而更好地与智能机器进行交互并且驾驭它们。”

交叉与驾驭：教育的发展总是滞后于科技，而教育要与科技共同发挥作用，两者必须相互引领和交换驾驭

相对而言，在教育与科技交叉或同步的发展中，教育的发展速度总是滞后于科技，两者的交叉或交替发展的过程中，科技的引领与驾驭作用相对显著。在这种态势下，我们更需要提出的是，教育与科技共同发挥作用，相互引领和驾驭。

英国的威尔士正在进行教学改革的“电子先锋示范学校”令人震惊。这里3-11岁的孩子们对电子产品都操作娴熟，对我们大人爱用的应用软件、社交网络等都如数家珍。校长卢克说，他非常鼓励孩子们在学生学习生活中用上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不管是平板、电脑，还是虚拟现实眼镜、健康手环。从学前班开始，几乎每堂课都使用电子设备。

英国圣朱利安小学用3D打印小防空洞的历史课，自拍视频表达自己想法回应别人的读写素养课，跟一位农场农夫视频对话的生活课，戴上眼镜看到太阳月亮天文课，可以看见身体内各类器官活动的人体健康课，自己做计步器实验作品的体育课等全用上电子产品的课程……圣朱利安小学校长解释电子产品运用在课程上的理念和意图时说：“我们希望通过其它学科来教授数字技能。……但我们更希望帮助学生理解我们如何运用科技来支持其它学科，让科技更有实际意义。”

以色列这一点也值得关注。在一个人烟稀疏的地方竟然有一个高中机器人俱乐部，不少学生在那里共同建造机器人，让机器人去完成任务，如清洁、整理等。学生试着解决一些跟公共空间有关的问题，因为这样可以改变社区。如果研究项目足够好，就可以做成产品给公司，并与公司达成协议，使这个产品为社区所用。

其实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和科研机构开始向青少年开放，比如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让孩子们有足够的尝试机会，做各种实验，让他们领略学科的魅力；清华幸福科技实验室，通过心电图、脑数据，进行相应学习能力、压力值和潜能父母的测试与分析，为家长提供参考，以便更好地了解孩子……

但是，科技与教育的结合并非教育单纯地与高科技设备的结合，而是教会孩子们“理解电脑时代的思考逻辑。从而更好地与智能机器进行交互并且驾驭它们”。这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高质量师资能够推动教育与科技协同释放潜能，教育与科技等学科交叉与突破。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本版图片：视觉中国



从小环境到大气候，耐心等待10年也不为多

学校里的老师，原先成果能够发表就是成功，现在对国家贡献度的考核也被纳入评估体系。但是对于学院来说，晋升的评价体系仍然很难快速改变。而这也取决于行业研究是否会产生具有显示度的成果。但是这绝非短期就能实现，可能需要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

幸运的是，目前我们不仅得到了行业众多企业的认可，同时在去年一年中开始逐渐为政府决策提供一些真正的咨政参考。

要参透一个行业奥秘需要多少时间？可能一年，可能两年，很多人花了一辈子。一个月或者半年的速成是不行的。在我看来，推动行业研究与当下中国商学院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当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耐心等待，才能真正收获有价